

西藏春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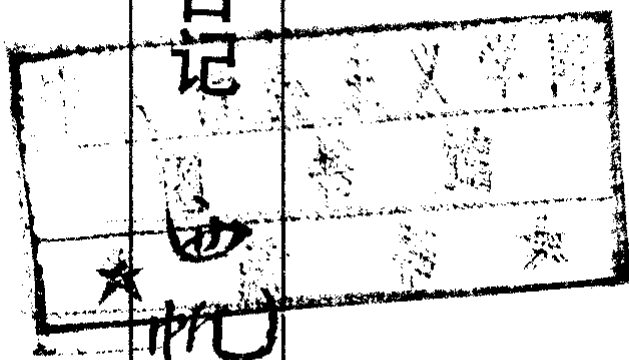
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

林田著

林田著

西藏春潮

——一个记者关于西藏民主改革的日记



题



中国藏学出版社

丛书前言

《西藏学汉文文献丛书》原名《西藏研究丛刊》，遵照藏学界朋友们的建议，自第二辑起改用今名延续出版。

第二辑暂定部分选题八种，即《全唐文全唐诗吐蕃史料》、《清政府与喇嘛教》（附清代喇嘛教碑刻录）、《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康纪事诗本事注》、《川边历史资料选编》、《清代藏事奏牍》、《敦煌文书续集》和《西藏春潮》。其中除《清代藏事奏牍》和《西康纪事诗本事注》是这次增补校注重印外，其余六种都是首次成书，而且《清政府与喇嘛教》、《清代驻藏大臣传略》和《西藏春潮》，还是新近成篇的藏事专著。

编印这部丛书的主要目的，是想为当代学人提供些方便，为后世保存些文献史料。

藏学汉文文献史料相当丰富，有人估计自唐代以来的汉文藏事著述约千种左右，为数仅次于同类藏文文献，是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但以往从未经过系统整理，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和有关部门中，各家收藏有多有少，未听说哪一家的收藏是完全的，使用极为不便；一些早期出版的古

7167/60
籍，大都老化变质，触手纷纷碎落，已不堪用；数以万件计的汉文藏事档案和不少珍贵的稿本，正在不断散失，急待整理成书。鉴于以上情况，无论从藏学发展和西藏工作的迫切需要考虑，抑或从抢救文化遗产着想，都需要我们自己动手搜集整理这些文献。

起初，《丛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藏学研究者和在藏工作人员，现在已行销全国，并跨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对我们是鼓励，也是鞭策，将督促我们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并做得好一点，为国内外藏学界多做些服务工作。人类总是不断进步的，如果我们的丛书有助于海外学者和其他外国朋友了解西藏真情，有助于国内外学术交流，有助于藏学的发展，有助于增进民族团结，那将是一大幸事。

《丛书》是一部资料书，编纂这类资料丛书，我们主张力求其全，力求准确，力求有用。只要是较有价值的藏学文献，我们都准备编入《丛书》。《丛书》拟收录的文献史料约百种左右，业已印行三十多种。

在个别藏学专家眼里，整理藏学文献是难入藏学研究之流的，但离开文献史料，专家又立足于何地？世上人多，各有所好，我们自觉地干上这一行，至今不悔，不但不悔，而且郑重表示：我们立志为国内外藏学界当资料员，还要力争做一个合格的资料员。

牛力耕

一九八八年九月一日

林田的记者生涯和他的西藏日记

—为《西藏春潮》出版而作

陈家珽

林田同志的《西藏春潮》就要付印了。这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

这本书是记述西藏山南地区民主改革的一部日记，写于一九五九年夏秋间。书中所记的事已过去三十一年，可贵的是《西藏春潮》对这场废除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斗争留下了具体而生动的记录，使得我们打开书本，眼前就可以重现这段开辟了西藏人民新时代的历史。

对于这本书的评价，要留给读者去作。但我作为第一读者，如果可以预先谈点什么的话，那么我要说的，也是我最突出的感想，就是四个字：文如其人。

我与林田相识四十多年，过从颇多。我们年轻时作为新华社记者一起在西藏期间，同甘共苦，多次合作，“冰原并辔抒心志，雪地同毡话乾坤”（林赠我诗中语），可说是老朋友了。这次我又为《西藏春潮》的出版当了编辑，所以很想借这个机会谈一点关于他的记者生涯和他的西藏日记的情况，也许对读者有些用处。

林田是河北乐亭人，新华社高级记者，担任过多年的分社领导工作。

他的记者生涯中有三个特点。

其一，是长期在艰苦地方工作。

他当了四十年记者，大约有三十六七年在边远地区采访。按他自己的说法，叫“靠边转”。他一九四八年到新华社，参加了淮海、渡江等战役和进军大西南的报道工作。一九五〇年夏天，他刚刚从川、贵剿匪前线回到重庆，就马上又打起背包，奉命前往加入了进军西藏的行列，这一去就在西藏干了六个年头。嗣后，回北京不久，又自己要求到了内蒙古，后来又从那里被调到甘肃。这些地方可不是人人都爱去的。当年，不是流行过“天（津）南（京）海（上海）北（京）都爱去，就是不去新（疆）西（藏）兰（州）”这样一句话吗？林田不曾去新疆，“新西兰”少去一处，可是他去了“蒙西兰”，还是“靠边转”。这么一转，从青春年少转到了满头花发。但他转得自觉，转得高兴，而且转到哪个地方，就爱上哪个地方。每逢谈起那里的人物山川，总是兴致勃勃，一往情深，说话间起立踱步，指指点点，嗓门越来越高，两只眼睛也明亮起来，那神气好像是说凡他去过的地方，都是世界上最好最重要的地方。

“靠边转”毕竟是艰苦的，尤其是在西藏开头那几年。爬雪山、走草地，铺冰卧雪，以马料野菜为口粮，一连几个月忍饥挨饿；有时候发霉的糌粑把人们的肚子胀得圆圆的，其苦，

甚至挨饿。这些都是进军西藏期间不只一次遇到的事。到达拉萨以后，因住房极其紧张，我们曾一起打地铺睡在厕所门外的过道里，地冷风寒，通夜暖不热身子，往往半夜冻得爬起来点上蜡头抽旱烟。长期的难苦生活，给林田留下了胃溃疡。他不当回事，又老是忙于工作，没有及时治疗，以致病情越来越重，很受折磨。记得一九五三年元月，我们从日喀则回拉萨，途中他胃病犯了，疼得下了马就地打滚，抱腹呻吟，脸色如地皮。当时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身边又没药，真是急死人。但过一会儿他病痛稍有缓解，就催我一起上马登程。当晚在业当村住宿后，他照常用初学的藏语同房东聊天，了解群众生活情况，口问手写，谈笑风生，好象从未生过病一样。一九五四年冬，康藏公路即将修到拉萨，我们筑路报道组工作很紧张，他胃病屡发，要我向工地医生“求情”，给了他二十几片含鸦片的止痛药，他与医生达成“协议”，每天不超过两片，他就靠这个药片坚持完成报道工作。

有几年，林田靠吃乌贼骨粉止胃疼，自名之日：“开小灶”，无论到哪儿去，身边总带一小袋专用的“小锅饭”，以备不时之需。后来吃下的骨粉越来越多，而溃疡发作的次数也越来越频，“小锅饭”不灵了，他这才下狠心放下工作，把胃切除了一大半儿。手术后，同志们看他身体垮了，劝他快回北京，再不要靠边转了。有一阵子，有关领导也曾表示关心，同意调他到北京或天津工作，但终因他不愿为个人的事去“活动”，而未调成。他不顾手术后经常出现低血糖引起的心

慌手抖，又带上他的“小锅饭”口袋回大西北靠边转去了。不过这时的“小锅饭”不是骨粉，而是几块应急的饼干，是对付低血糖的。同志们都为他的健康担心，谁知他三转两转，身体倒慢慢好起来了，早已甩掉了“小锅饭”口袋，这也叫善有善报吧。现今他索性在甘肃扎了根，心安理得地做了“老甘”。

其二，他爱往下面跑。

林田随军进藏和驻藏六年，在机关的日子屈指可数。他不是部队基层、建筑工地，就是在农村牧区。六年间，他在拉萨市和现今的六个专区都留下了脚印。

他不怕吃苦，哪里艰苦，哪里有群众的创造事业，他就跑到哪里去，生活在群众中间，同群众交朋友，通过访问、观察和体验，占有大量的材料，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写出文章来。一九五〇到一九五一年，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进藏部队的连队里，同战士们一起跋涉于难险的高原征途。部队上雪山修公路，他也随部队上雪山，住在战士的帐篷里，同战士一样吃野菜糌粑糊糊，还半天采访，半天到班里和战士一起开山筑路。一九五二年和一九五三年，他两次访问后藏的农村牧区，多次住进农奴的小土屋和牧民的牛毛帐篷里，了解农奴和牧民的病苦与要求，同他们一起围着牛粪火谈至深夜，然后席地而眠。一九五四年，他在康藏公路工地采访，常常攀高涉险，风里来，雨里去，艰辛异常。一九五五年，他重返昌都地区，奔波于横断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一九五六

年；他随中共西藏工委派出的黑(河)阿(里)公路探路队，穿过人迹罕见的“羌塘”(藏北高原)到阿里，同勘探人员一起度过了一个半月的探险生活。抵阿里后，又骑马骑骆驼访问了海拔近五千米的高寒牧区和喜马拉雅山山区农村。这次在“世界屋脊的屋脊”上采访，前后历时七个多月，他和同行的《西藏日报》的倪潜同志，是最早访问羌塘和阿里的记者。一九五九年，他正在内蒙古工作，西藏发生反动农奴主叛乱，他第二次被总社派往西藏，他到拉萨不久，就主动要求去山南地区农村，因为那里平息叛乱后，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火热斗争已经开始。在山南，他选择了中共山南分工委进行民主改革试点的凯松谿卡(谿卡即庄园)作为采访调查的据点。这个庄园是西藏大农奴主、首席“噶伦”(原西藏地方政府执政官)、叛匪首领索康·旺清格勒家最早的庄园之一，它在完整保留与体现农奴制庄园经济的基本特征方面，具有典型意义。林田在这个庄园一蹲就是三个半月，除了有时到上面跑一跑以外，大部分时间与工作组同志和农会委员(翻身农奴代表)同吃同住，对农奴制度和民主改革的全过程作了深入的调查研究。

以后他在内蒙古和甘肃工作，仍然保持着喜欢下基层，到群众中去的作风。正是这种眼睛向下深入群众的采访作风，使他能了解到有些记者不注意或不屑于了解的有关群众思想和生活的真实材料，使他的新闻报道不仅能比较准确、生动地表现群众的斗争与生活，而且能比较早地反映出

群众的意见、愿望和呼声。不少新闻作品中，流露出他与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的诚挚感情，我认为这些正是一个记者最可贵的品质。

其三、他坚持记采访日记。

林田在西藏期间，除采写了大量新闻报道和调查报告外，还长期坚持写日记，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一种习惯和爱好。他的日记与一般人的日记不同，常常只要下去采访就一天也不间断地记，回机关整理材料，写稿子时就停下。他常说：我的日记是采访日记，是记下作为记者应当记录而当场在采访本上来不及记的东西。因此其内容十分丰富，不仅有采访对象的谈话内容，神态，事件与场面的情景，而且还有他个人的感受以及对环境、风光的描绘等等。

他最早的日记是作为随军记者在进军大西南的行程中记下来的（这本日记即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书名《大军西南行》）。那以后，好象他已意识到一个记者记录历史的责任，从进藏开始，就更详细地记起日记来，无论条件多么艰苦，身体多么劳累，总有记述，很少间断。

他在西藏期间的日记，按时间顺序和内容分类，可以列为四个专题：进军西藏日记、筑路日记、羌塘阿里日记和民主改革日记。其中进军日记在五十年代初发表过一小部分，很受读者欢迎，有两篇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全部进军日记十几万字，有待整理出版。筑路日记五万多字，已收入《川藏青藏公路通车三十周年文献集》中，是该集的重要篇章。

民主改革日记就是《西藏春潮》的主体部分，也有数万字。在这三部日记里，林田依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和现场收集的大量第一手材料，详细记述了关系到西藏人民的命运和前途的三件大事，从若干侧面真实、生动地反映了西藏和平解放头十年的历史。羌塘阿里日记也有其独特价值，因为是新中国记者关于这块鲜为人知的地域的最早的记述，现在林田正在整理。有人建议林田将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这几种日记汇集在一起，出一部《西藏日记》，我觉得是一个好主意，如能实现，当是一件功德之事。

林田是个老实人，他写的文章也是老老实实的文章。无论记事写人，务求准确真实，不雕凿，不粉饰，宁以平易之词写出真情实谛见长，而不以故作巧言或卖弄噱头取胜。或有感慨议论，也必言出肺腑。因此一般来说，他的文章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检验，得到读者的信任。他的这种求真务实的文风，在日记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且由于写日记不受某些格式或框框的限制，写什么，不写什么，这样写，还是那样写，或长或短，或详或略，都取决于自己，所以他写起日记来，好象思想更开阔了，手脚更灵活了，文笔也更流畅了。比起他的有些文章来，他的日记写得更真切，更活泼，也更吸引人。读他的日记，就象听他用乐亭乡音讲故事，朴实而动人。他所写的关于西藏几件大事的日记，都翔实而具体；他笔下的人物，淳朴而生动；他爱憎分明，字里行间充满着对战士的热爱，对农奴和奴隶的无限同情，以及对封建农奴制

度的憎恶。他对劳动人民的真挚情意，感人至深。当年参加过进军和筑路的老同志，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找到自己的影子，重温那个年代的战斗生活，得到安慰和力量；当年参加过民主改革的西藏老辈，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重读自己的翻身史，会更加自觉地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进一步坚定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信心；出生在新社会的西藏新一代，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懂得什么叫封建农奴制度，什么叫新社会，以及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人；研究藏学的专家学者，可以从林田的日记里找到难得的珍贵史料，会使研究工作更好地联系群众和实际；对西藏存有某些疑问的外国朋友，仔细读一读林田的日记，如果不抱偏见，就会对西藏的事情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它们所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是真心实意帮助西藏人民的；推翻封建农奴制度的西藏的革命，是西藏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和西藏现代化的必要前提条件；百万农奴在共产党领导下粉碎农奴制度的锁链，取得做人的权利，的最伟大的人权运动，也是真正的最广泛的人道主义的胜利。近十年来，我因整理西藏汉文历史文献，留心阅读过的清代以来入藏人员的日记著作不下十余种。这些日记各有独到之处，都有流传的价值。但由于作者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和其他原因，这些日记中又都有不足和可议之处。就日记涉及的事件、思想内容、记事的准确和对待人民群众的态度来说，林田的西藏日记，都是前人的日记不能与之相比的。可以想象，再过若干年，

人们也许会发现林田日记的更重要的价值。

最后我还想讲一点，林田写下这些日记是很不容易的。这需要毅力，需要难辛的劳动，需要强烈的责任感和高度的事业精神。

进军西藏开始时，康定以西还没有公路。跨越整个横断山脉的数千里的草原古道上，重重雪山，条条冰河，高寒缺氧，气候多变。在这样的环境里，空手走路犹感艰难，而战士们却要每人身背七八十斤的口粮、装备行进。每当爬山临近山顶，空气更加稀薄，人们呼吸更加困难，只能一点一点向上挪动。高原冰河多为雪水，冬季渡河，两腿入水便觉砭骨刺心，待挣扎上岸，腿脚早已麻木，石子冻结在脚底上。林田作为年轻记者，不仅自己也负重四五十斤和战士一起每天跋涉十个小时以上，而且常常帮病号扛枪背米袋，到宿营地和大家一起架帐篷、拾烧柴，直到人们吃过饭并入睡以后，他才带着一天的劳累，在帐篷一角就着摇曳的烛光，开始记下一天的见闻。

林田的筑路日记大部分写于康藏公路的波密地区。这个地方山高坡陡，地质结构复杂不稳，常有山崩石滚，流沙塌泻。夏秋多雨，山洪和泥石流不时奔腾呼啸而下。筑路大军在这里遇到了从未遇到过的艰险工程，为修通这段一百八十公里的公路，五万多名战士、工人苦战了一百八十多个日夜，成千名的同志献出了生命。在这战场一般的工地上，林田常常携带一件雨衣，背一挎包，不分昼夜地攀崖爬

坡，观察访问。他不顾险工地段随时有伤亡危险，走遍了每个工区。在他写日记的工地帐篷里，白天闷热似蒸笼，夜晚大个蚊子和各种毒虫蜂拥而来。林田为记日记，不知流了多少汗水，挨了多少蚊子叮咬。至于在类似探险生活的条件下记下藏北高原日记，在与农奴同吃同住中记下民主改革日记，其所付辛劳与忍受的困苦亦可想而知。可以说，林田的西藏日记，四个部分共数十万言，字字皆辛苦写成。

林田曾风趣地自嘲说：我“命”苦，是个“三苦记者”；一是多在难苦地区工作；二是多采访报道劳苦群众；三是自知愚拙，靠刻苦精神效命人民。他还讲过。他的记者生涯中吃苦不少，工作是勤恳的，但成绩并不大。从他自己说，这些都是真心话，由此更可看出他严以待己、责己的情操。不过，虽然由于种种原因，他没有成为声噪一时的名记者，但他的实际成绩和对人民的贡献却不算小。许多人都记得，无论是在进军大西南，进军西藏的历史壮举中，还是在包钢和大兴安岭的开发建设中，以及最后在甘肃的农村经济改革中，林田都留下了若干深受读者欢迎的新闻作品。而这只是他的成绩的一部分。另一部分，也许是更重要的一部分，则是他的日记，特别是西藏日记。它的出版，可以算是对我们“三苦记者”的一种报偿，因为吃苦者看到自己的劳动果实奉献于别人面前，就是最大的“苦中有乐”。

一九九〇年七月

于北京

自 序

这里献在读者面前的，是三十年前我作为新华社记者，在西藏山南地区采访民主改革的几个月的日记，以及同一时期写的调查报告和报道。这些调查和报道，有几篇曾在报刊上登载过，而大部分由于各种原因当时并未发表，现在也如日记一样是第一次刊印出来。

有的同志曾建议我把日记改写成系列文章，但我自己更珍惜的，却是它的原始记录的性质。我希望有机会打开这本书的人，也能把它作为原始资料来阅读、研究。因为这本小书的价值就在于用我自己的所见所闻，如实地、不加任何雕琢地描绘、分析了西藏农奴制度，记录了废除这种制度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不足之处是缺乏全貌性的资料和宏观背景情况。但我不揣冒昧地说，对于关心西藏人民命运和有兴趣研究西藏问题的人来说，抽象的、概括性的材料容易找到，而这样直接、具体、真实地记录历史的材料却不是随处可以得到的。正因为考虑到这点，所以我在抄写、整理这些日记和文稿时，除改动了一些错别字和不通顺的句子，以及在少数几处读者难懂的地方加了一些说明性的语句以外，其余一律保持原样。

历史已经证明，每个民族在其发展中都有它的值得骄傲的伟大的进步的时代，有它的阳光灿烂的生机勃勃的日子。一九五九年初夏开始的这段时间，正是世代居住在“世界屋脊”上的西藏人民的这样的时刻和日子。在此以前，西藏一直保留着带有浓厚奴隶制残余的农奴制。这种社会制度，如果不是当代世界上最反动、最黑暗、最残酷的制度，至少也是这种制度中的一种。为了说明西藏社会上层同意改变这种极不人道的封建农奴制，中国共产党和包括上层爱国进步人士在内的西藏人民，在西藏和平解放后整整等待了八年，最后一小撮反动的大农奴主还是发动了武装叛乱。不管他们在叛乱中打着什么旗号，其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永远维护这种腐朽的制度。不过事态发展与他们的愿望相反，叛乱及其被迅速平息，大大加快了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的到来。而经过这场短短几个月的和平的革命——民主改革，就使百万农奴结束了千年悲惨、屈辱的岁月，开始了有作人权利的新生活；使这个久被遗忘、压抑的古老的民族一下子年轻起来。歌声笑语代替了痛苦的呻吟，自由劳动代替了皮鞭下的苦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代替了精神上的麻木和叹息。劳动人民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精神振奋，情绪昂扬。高原上处处涌动着一股春天的气息。不管在以后的发展进程中出现什么曲折，这次民主改革对于西藏民族都是决定历史命运的一次伟大的转折。

我是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随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

的，并在那里生活过六年。那时我常常为农奴制度下的西藏劳动人民过的非人生活和遭受的凌辱而感到痛苦。一九五九年我第二次赴藏采访，又和农奴们共享了他们翻身解放的欢乐。因此我深知我记录的这场革命在西藏人民心中的份量和地位。

我希望西藏的读者能喜欢这本小书。也诚心希望国内外对西藏问题感兴趣的人士能读到我记下的这些材料。这样他们就会知道，那些年代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在西藏究竟做了些什么。同时也可以作出判断：当某些国家的政界人士和参加过西藏叛乱的流亡者沆瀣一气，向我国政府要求“人权”的时候，他们的语言的真实含义是什么！

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要特别感谢阿旺丁曾和陈家珽同志。本书中几乎所有的材料，都是阿旺同志和我一起采访并由他翻译而收集到的。而陈家珽同志是出版这本书的主持者和促成者，没有他的屡次提醒和帮助，我的日记本和文稿底稿，就只能在我身后留给老鼠去磨牙齿了。

林 田

一九八九年二月于兰州

目 录

丛书前言

林田的记者生涯和他的西藏日记

为《西藏春潮》出版而作

自序

西藏民主改革日记

山南农村纪事

附录

拉萨叛乱纪实

西藏民主改革日记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一日

十四日飞抵拉萨，十六日开始了采访报道工作。这是我第二次来到西藏。第一次，从随军进藏开始，我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多，所见所闻，常常使人忧郁压抑，今天可不同了。

由一小撮反动大农奴主发动的武装叛乱已被平息。五月的拉萨，充满了阳光。这个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古城，今天真正有了青春。她，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人们的思想、行动、社会地位等等的变化，几十天胜过了几百年。拉萨从来没有这样安宁，更从来没有这样活跃。

西藏社会，迄今以前的千百年中几乎是停滞不前的。但并非藏族人民缺乏活力，相反，这是一个活泼的民族。阻碍西藏前进的，是僵尸一样的农奴制度，是压在嫩草上的大石板似的反动上层。今天，僵尸正在被铲除，大石板被掀开了，藏族人民的革命热情、生活兴趣、生命力……都高涨起来了。

记得我第一次进藏住在拉萨的几年，经常看到“噶厦”

(原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和贵族，穿着金线紫锦袍、黄马褂，头戴红缨帽，骑着屁股滚圆的大走骡，随从仆役的马队前呼后拥，威风凛凛从狭窄的街道上通过时，百姓们赶快闪在一边，解下盘在头上的辫子，哈腰吐舌，表示敬畏。现在这种人、这种威风都不存在了。他们有的逃跑了，有的躲在家里了。倒是农奴和奴隶们大摇大摆自由自在地走在街上，居民委员会一声通知，贵族老爷和他们的夫人、小姐和普通百姓一起，扛着镐头，背着筐子，来参加义务劳动，清理臭水沟来了。以前，他们骑马走过还要掩着鼻子呢！

以前，活佛“堪布”(寺院或寺院某一部分的总管)拉的屎尿都是神药、圣物；现在，穿着满是油污的破袈裟的下层喇嘛和面黄肌瘦的农奴，在那些参叛的肥头大耳活佛、堪布面前，晃动着拳头大声控诉。

以前，瘦骨嶙峋的农奴、奴隶们，匍匐在庄园领主老爷们的脚下，乞求他们延缓债期，饶恕根本不曾有的过错；现在，领主派的索债人又来了，但只低声地要求还债，农奴们也客气地说：“请等一等吧！”他们就悄悄走了。

以前，“朗生”(家奴)们——一生被榨干的老头儿、老婆婆、被凌辱与损害的姑娘、被打呆了的孩子，呻吟在老爷、管家的皮鞭和皮掌下，现在奴隶们走出了红漆大门，毫无畏惧地向主人说：我们自由了，不是你们的牛马了！

以前，在金碧辉煌的殿堂里，阴森森的寺院里，凶神

恶煞们剜人眼，抽人筋，剥人皮；现在，那伪善、黑暗的殿堂、寺院、牢狱被打开了，种种罪恶曝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而获得自由的农奴、奴隶们，以前受鄙视的“贱民”们，现在又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呢？

木匠强巴、做香的班丹、刻经的扎西，还有织氍毹的姑娘拉姆次仁，都当了居民委员会的主任。他们协助军管会搜查叛匪丢下和藏起的枪支，维护治安，领导居民清阴沟、办学校、排歌舞、种蔬菜……他（她）们说一句话，贵族“啦嗖！啦嗖”（“是！是！”）的，真神气得很呢！但他们也懂得政策，对不服输的叛匪、坏家伙很不客气（一个小姑娘提到顽抗的叛匪头子，说他们是“该被消灭的一类”），而对爱国上层（无论贵族、官员或活佛、堪布），还称他们为“古秀”（先生）。这些受过压迫剥削的人，渴望改革。有的说：分了土地、房屋、种子，中央会贷给的，只是没有牛和犁怎么办？你看，他们已在考虑实际问题了。

贵族马雅家的“朗生”，十九岁的普布苍觉，没等改革，就自己从主人家走出来了，当了建筑工程处的小工。她说：我今天自由地劳动，自由地生活。让马雅的老丈母娘咬牙去吧！反正我不再进他家的门！

二区（南区）第八居委会131户人家，全是“棚户”，八十多家是讨饭的。札西是他们的主任，把大家组织起来，

开了七“克”种子的菜地（一克粮二十八斤，撒一克种子的土地约一亩），男男女女，大人孩子，都在做菜园的篱笆。地是解放军部队帮助开垦的，因为他们除两只手外什么也没有啊！札西说：我想帮助大家，可是我自己也很困难，手长袖子短啊！不过有了共产党，慢慢袖子就不短了。现在这个居委会会有八十多人就业，“贱民”第一次作“人”了！当然，这些人要完全觉悟起来，要全部就业，还有一个过程。一个叫仓君的老妈妈家有十几口人，三个作了小工，收入仍不够全家吃饭。老妈妈说：“说老实话，最近讨饭不好讨了。”但大家都愿意作工，愿意劳动，这就有出路！

昨天（二十日）二区民办小学开学，借用朗顿（大贵族、十三世达赖家属）家的院子布置了会场。人们象过节一样穿着新衣来了，把一条条“哈达”（表示敬意或祝贺而赠献的丝巾）挂在毛主席像两旁。居委会的强巴致词说：我们穷人当家做主了，要学文化，学政治……一个十多岁的孩子也讲了话。由青年男女组成的歌舞队来了，姑娘们穿着绸衫、彩裙，头上戴着青青的柳枝圈，小伙子们穿着锃亮的高统靴。琴弦响了，青年们跳着唱起来了：

旧社会里，

百姓尽受苦，

今天幸福的日子来了，

社会主义的花儿要开了，

……

人间冷暖，人和人的关系变了。东区一位一百零八岁的老人，以前，每天从人家屋檐下爬到路边乞食；现在居委会给他找了房子，福利委员把糌粑、酥油送到他手里，病了还给他请医生。老人颤巍巍地说：“我不是在做梦吧！”说着，哭了。老人啊！你不是在做梦，是真实的生活。可惜您老人家在吃人的农奴制度下受苦受难一生，天亮了，你已是风烛残年了！

拉萨，高原的古城，藏族人民心中的圣地，汉藏民族交友的中心，世界人民心目中神秘之城……善良的藏族人民为你编织了多少美丽的神话，寄予你多少美好的幻想，今天，由你们自己把美好的神话和幻想来实现的日子开始了！

早晨，我站在高高的房顶上，
四处是，
红旗，风旌（经），
绿树掩映的石砌的楼房，
寺院金顶上的鸽群。
大街上，
老婆婆扫过地，洒上吉祥清洁的石灰图案，
姑娘们背着水桶从拉萨河回来了，
汽车、骡马，驮着牛粪袋的毛驴，
香摊、藏经摊，
熙熙攘攘的人群，

透过这一切，

一场和平的革命在酝酿着、进行着……

尽管上层反动集团竭力阻挠西藏前进，但几年来，农奴和奴隶们已等得不耐烦了，过时了几百年的农奴制度该结束了。党组织和解放军播下的革命种子要生根开花了。最近，从中央民族学院、西南民族学院、西藏公学，一批批藏族青年男女学成回来了。他们是农奴、奴隶的儿女，也有少数爱国上层子弟，如今都成了干部。他们将作为骨干，参与这个伟大的进程。

五月二十二日

天清气和。上午到龙王塘，看藏民游园。

今天是藏历四月十五日，按藏俗为释迦牟尼圆寂日（据说是释迦牟尼涅槃二五〇三年）。拉萨市许多居民委员会都组织了歌舞队，到这个林园来跳舞唱歌。树荫下草地上搭了许多花帐篷，大人孩子穿着红红绿绿，人们自由自在，喜气洋洋。

拉萨，两个月以前被搞得乌烟瘴气，现在烟消云散，雨过天晴，真的成了“日光城”。过去千百年中，它是建立在奴隶、农奴制基础上的政治中心，一切给人一种阴森森的印象，今天，处处充满了自由解放和民主的气氛。过去，奴隶、农奴、贫民（小手工业者、小商贩等）只能俯首听命；今天他们组织起来，管理自己。过去千百年来，

文化被贵族、寺院垄断着，奴隶、农奴、贫民除非当喇嘛，很少识字的；今天，百姓们纷纷要求办学，学文化；过去，拉萨大街小巷污秽不堪，每到宗教节日，喇嘛下山，香客纷至，群众进城，于是街道上遍地屎尿，臭气熏天；今天，居民委员会组织大家扫街道，清阴沟，修厕所，四处干干净净。

决定写一通讯《拉萨的春潮》，记述拉萨民主改革和历史性变化的开始。

五月二十八日

今天访问了大农奴主贵族、原“噶厦”（西藏地方政府）首席“噶伦”（噶厦主事官员）索康·旺清格勒（已叛逃）家的两个“朗生”，一个是老牧牛人，一个是老伙夫。

牧牛人是个老婆婆，六十一岁。她原是索康乡下庄园中一个农奴，十五岁起到拉萨给索康家当朗生。每天挤完奶把母牛赶出去放牧。一年前主人派她到药王山以南参加修拉萨河河堤，大腿骨脱臼，主人当即派人把她捆在马鞍上，象驮毛布口袋一样送回老家聂当，两个月不会动，主人只发给她些大豆（蚕豆）糌粑，找个藏医治疗没治好。日久不能干活，主人连糌粑也不给了，她就沿途爬着讨饭，爬回了拉萨，但主人不收，不让进屋子，她就住厕所下一个角落，靠一个破车挡风，老伙夫偷偷给点东西吃，以后拐着腿讨饭。

老婆婆说，我给索康家干活三十多年，索康老婆只给过我一件破绸衫，最后象狗一样活着。“现在好了。平叛后军管会发给了我半年口粮，有白面、糌粑、清油，还有辣子，分给了我一间房子。”

老婆婆牙齿掉光了，笑起来象个小孩儿。她把我们领进她的房子，幽默地说：“这是我的‘撒木厦萨巴’（新公馆）”。然后又一瘸一瘸地把我们领到她原来住的地方。这里头顶上是厕所，粪尿通过厕所地板上的方孔漏到下边的粪坑里，老婆婆过去就一直住在粪坑跟前的墙角里。老婆婆指着这个臭哄哄的角落说：“这是我的‘撒木厦宁巴’（旧公馆）。”我很惊奇老人在经历了多年非人生活的折磨以后性格还这样开朗活泼，也许新的生活使她返老还童了。我告别她时，她再一次说她的生活“吉博希札——啞！”（幸福得很啊！）

老伙夫原是雅鲁藏布江边“札”地方的人，家是索康一处庄园的“差巴”（农奴制下农奴的一个等级，按领主的规定耕种庄园的若干土地，按土地多少向领主服劳役、交纳实物，即支差纳粮。差巴户世代相袭。），三十岁时来给索康家当“壳差”（男差），三十年没回家。年轻力壮时，跟着索康家的骡帮作伙夫。老了后留在索康家的厨房里，背水、抱柴、倒脏水。他面黄浮肿，手指肿得象小孩的胳膊。

这些老人为贵族服役耗尽了一生精力，最后落得病的

病、残的残。

六月二日

在拉萨住半月，搞了些见闻性采访。原定昨天出发赴山南，采访农村民主改革，当日未成行，住汽车车站。隔壁住一藏族干部，妻子是白族，八个孩子，吃饭时排了一个小小的长队。

今早九点从汽车站出发，出拉萨市，太阳已升高，阳光灿烂明媚。田野里青稞、豌豆郁郁葱葱，几处草坝上，牛、驴在悠闲地吃草，村庄里有人在盖新房，妇女们在齐声唱着打地基，一片和平生活景象。农奴们今春第一次自由地耕种土地，不交租，不支差，夜里睡觉不担惊受怕。他们不在乎眼前的困难，怀着喜悦憧憬着未来。

傍拉萨河前行，路边一种不知名的野花，一片片开在山崖上。黑色的肥胖的四脚蛇，在灼热的光石上窜来窜去，停车休息时，它们一见人就跑开了。

天很热，中午在曲水兵站吃饭。这里雅鲁藏布江水面广阔，水势平稳，历来为拉萨通向山南、江孜以及后藏的主要渡口。现在拉萨通往这些地方的公路也在这里过江。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江水里修码头，汽车由木船摆渡。我拍了几张照片。过江后遇从山南回来的车队，路狭窄，错车时很危险，但驾驶员泰然自若，车速不减。

到江南岸，傍山沿江东行约十多公里，远远看到山头

上的红色城堡，这就是贡嘎宗。山头上还有两个寺院，喇嘛参加了叛乱，早已逃走。山下沿江道路为通路咽喉，去年十二月间，这两寺的喇嘛曾伏击我解放军车队，一辆汽车被烧毁，一辆被推到江里，几名战士牺牲。

晚上住在山下一个差巴户家里。主人的儿子名西饶门巴，二十一岁，是个聪明有趣的青年。他讲：今年二、三月间，叛匪（多为康巴——西康人）在此地住了两个月，约二、三百人。加上在拉萨败后撤到这里的，多时达千余人，“我家就住了二十多人。他们没到以前，就派人送信说：‘德卫马卡’（卫教军）就来，作好准备。他们一到，就‘糌粑扣！杂扣秀！’（拿糌粑来！拿柴草来！）吃的抢光，青壮年妇女奸污光，不给就抡起马鞭。什么‘卫教军’，实际是‘毁教军’（德息马卡）。”这个青年还说：“一天早晨，我还睡着，一个康巴叛匪闯进来，把我的毯子拿走，说借用一下。我说‘用完还我呀！’他说可以。结果拿出去放在已备好的马鞍上，把抢的其它东西也放在上边，回头向我说了声‘雅博休！’（好好坐着！）就上马走了。真是一伙强盗。”

傍晚时江上来了两只牛皮船，几个乘客穿着打扮似颇富有，部队盘问了一下放行了。

部队驻在山上，修了盘山路，汽车、大炮开上山顶，控制了这江边要道。遇到一部队干部，对我们很热情。

晚上喝了甜茶，还喝了点酒。睡时，外面铃声叮铃不

断，可能是毛驴在吃草。

六月三日

昨晚宿贡嘎。今早到山顶寺院旁部队驻地吃早饭。部队同志告知，这个寺的主持喇嘛很反动，今春曾组织参叛喇嘛伏击我部队，我伤亡几十位同志。他们在山头寺上，居高临下，出我不意，开枪滚石，猖狂得很。我后续部队上来，将此寺和南面山岭上另一小寺攻下，喇嘛全部逃走。现已陆续回来几个。

我们费很大力气，气喘吁吁地爬到小寺山顶内。这寺经堂房舍，屋连脊比，片石砌成围墙、台阶，大殿雕梁画栋。一切建筑材料从山下运来，不知耗费多少人力。

太阳很高以后才启程沿江东行。沿途田畴碧绿，村落相望，好一片肥沃土地，美好风光，这是进入山南地区的第一个印象。由贡嘎向东，江谷越来越开阔，沿江有长达几十公里的水渠，渠流汨汨，麦苗已开始孕穗，妇女们在田野里放水、拔草，高声唱着藏戏。百里途中，田园景色尽皆如是。远见一处城堡，驾驶员说“吉独秀”快到了。沿途许多男女民工正在修路，妇女们背筐运石子，修涵洞。

吉独秀为西藏氍毹著名产地，据说几乎家家有织机，多少年来以此为生。从这里往东，江边多沙滩、荒野。江畔和山下台地上，有许多房屋废墟。可以想见，这一带原来也是人烟稠密的田畴，后来灌溉渠道失修颓废，沙吞良

田，差役重重，人家走散了。这是农奴制造成的农村破产景象。

又行约五十公里，江边沙滩上出现了一大片绿树，树木以东又出现了绿色的田野。向东看，江边山坡上一片红白相间的房舍、寺院，这就是山南古城泽当。和它遥遥相对，江北山头上有一座白色的城堡，名“颇章噶布”（白宫）也是一处古老的宫城。相传泽当是西藏先民的发祥地和前期的活动中心之一，周围古老的宫城建筑很多。看来整个山南地区的大部分则属于古代藏王都城的畿辅之地，现在仍是西藏主要产粮区之一。据说叛乱集团从拉萨溃逃后，曾设想在山南盘踞，一则山南地区比较富庶，可解决供给问题，二则向印度逃跑容易，后来看站不住脚，就从山南逃往国外去了。

汽车继续东行不远，见公路两旁新栽的小树已枝条青青，穿过江南平原，向南走不远，到了一个大村落，房舍人家很多，即乃东“宗”（县），现在是乃东县人民政府所在地。

老宗把我们接到了中共山南地区分工委住地夏洛村。分工委的院子里盖了一排排平房。军分区领导也住在院内。院的四周，有许多暗堡、壕沟，叛匪围攻时，为数很少的党、政、军机关的同志们在此坚守了七十四天。有许多英雄事迹。

见到了王运样书记和张增文副书记。他们正召集山南

地区各县县委书记和县长开会，研究、布置农村民主改革事宜。最近从拉萨来了不少藏族干部，院子里有许多小孩。晚上礼堂放电影。

六月四日

上午参加分工委书记王运祥召集的县委书记会议，听王书记布置今后三个月在全区农村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的工作。

午间小睡后去泽当。出了分工委大院，景家栋同志告诉我们，大院外这小山头，始终由我部队、工作人员控制，叛匪来围攻时，这小山头上的碉堡发挥了制高点的威力，敌人无可奈何，他们想挖掘沟道接近，未能得逞。现在还可看到这条没挖好的沟。

走不到三里，翻过一道小梁，就到了泽当。这古城现在实际上是一个小镇。房屋座落在小山坡和山根台地上，土、石墙涂了红的白的颜色。两处相距不远的高大建筑，有紫红色围檐的，是安觉寺和噶觉寺，原各有喇嘛百人左右，叛乱发生时，两寺成了叛匪指挥部，他们溃败时喇嘛逃走了。寺院下面是一条小街，有一、二十户小商铺，上午还有不少摆地摊的小贩，下午大都关门收摊。只一户回民开的小店还开着门，店主人是九年以前从拉萨搬来的，卖些各色土洋货物。叛匪占据这里时，抢走了手表、收音机、毛布料等，价值银元千多元。主人一见我们就诉苦。

小街各家窗台上都摆着花盆，红的黄的花朵和绿叶，鲜艳漂亮。

走出小街向南，荒滩边上有一处孤立的院落，中共山南分工委的部分单位住在这里。叛匪占领泽当时，工作人员在此坚守，院子不大，四处有几十个地堡、工事。一个炊事员有声有色地向我讲：当时泽当城被叛匪控制，他们居高临下，攻了我们七十四天，他们几千人，我们守这房子的只一百多人，他们始终没攻下。那些天，同志们一部分放哨、防守，一部分在暗堡里轮流睡觉，夜里就一齐上阵和叛匪交锋，几乎天天从深夜打到天亮。有几次，叛匪想挖沟接近院子用炸药炸，我们冲出去把他们打走，把炸药抢回。夜里还出去捉“舌头”。现在一个大高个儿种菜的和一个十七岁的姑娘（她已在分工委泽当工作组当工作人员），就是那时候捉回来的。他们都是被强迫参加叛乱，被捉回来经过诉苦和阶级教育，不愿走，就参加了工作。战斗中我们牺牲了十几个同志，包括分工委一个部长和上层爱国人士噶炯的儿子，是敌人用炸药炸塌房子被压死的。那可真是场艰苦的战斗！每夜，男女干部战士，一齐出动，打仗的打仗，做饭的做饭，还有的抬担架、护理伤员。

“为什么你们不集中到分工委南边的大院子去？”

“为什么？就为让叛匪知道我们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也让群众明白，我们是不会失败的。结果呢，打了七

十四天，我们胜利了！”这饮事员带着自豪的神情说：“那时候，真热闹，叛匪一早就吹号调炮，猖狂一时……”

从泽当回分工委住地夏洛村，路旁有不少藏族妇女在作土坯，说是要盖房子。泽当城外一角，有一个新修起的房子，这是原来房子被叛匪烧毁扒平，后来由解放军战士帮助修起来的。这家主人有个女儿，刚刚结婚，叛匪来了，要强奸，全家逃到分工委住地跟前搭个小棚住下，叛匪就把他家房子烧了。

六月五日

今早听说，我工作人员扣住了八个叛匪嫌疑分子，四男四女，说是从噶伦堡来的，衣襟里缝着给某些人的密信，其中一件大意为：我们坚决斗争，背后有美国，不怕。万一失败，可来噶伦堡，如来不成，可伪装进步……

上午到分工委社会部长那里，了解一下这情况。部长拿出了一包他们搜查到的这种“文件”，都是用印度的浅蓝色纸和白纸写的藏文，每张有一寸多宽，几寸长，用黄、蓝绸带捆着。还有几张照片，一个是横眉竖目的胖喇嘛，一个是面带凶相的藏商打扮的人。对这八个男女正在审问，他们自称是去印度朝佛回来的，尚无结果。

午后到雅鲁藏布江边牛皮船渡口。从泽当向西北不远，有一条由南向北流入大江的小河（名“相布”），河边两个姑娘赤脚站在灼热的石子上在晒洗好的毛毯被盖。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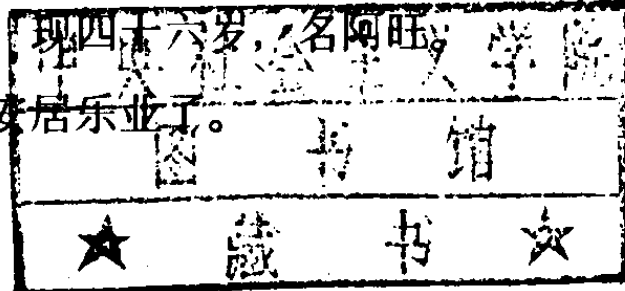
游，一个妇女带几个孩子在洗澡洗衣服，孩子们赤裸裸地站在炎日下，最小的一个看来不满周岁，晒得直哭，女人袒露着上半身在洗头发。这一家衣服破烂，看样子很穷，但嘻嘻哈哈很高兴。

我们走过独木桥，到小河西岸，再向北，约二里路，直到江边，是一片树林，多是高大葱翠的杨树。林间开着淡黄花的野刺玫，还有红下颏的小鸟，不住鸣叫的布谷，使人觉得清爽、幽静，心旷神怡。同行的任用昭、马兢秋赞不绝口：“这地方太美啦！”林边草地上有几个藏民在用干树枝烧茶，他们是木匠，给部队伐木料的。我很担心伐木破坏了这仙境般的环境。

出林边，到江滩，一片茸茸绿草。江水广阔，阳光下银光跳跃闪烁。岸边两只大牛皮船，是来运木柴的。这一带穷苦藏民以过江上山砍柴为生，干柴运到泽当，每八十斤（一驮）银元一元或碗茶一个。江边一个小老头儿，头顶前半部剃得光光，后半部梳成一条辫子，象个清朝的人，和妻子赶了四头毛驴，运了许多陶罐。他们是从穷结宗来的，是一个寺院的差巴户，烧制陶罐为生，每年向寺院交若干个。小老头说：从去年六月起，因叛匪抢劫，没有出来。这次是叛乱被平息后他第一次出来，用陶罐到江北桑耶去换糌粑和盐巴，他家已断盐多日。他说感谢解放军把叛匪打跑，百姓可以过太平日子了。他的名字叫索南。

从江边回来，见泽当城边树荫下一对藏民夫妇在织毛

翟德，男的十五岁起织毛布，



平叛后，古城泽当人民安居乐业了。

六月六日

早晨出发，随民主改革试点工作组同志去凯松谿卡（谿卡即庄园）。过乃东村，沿相布河南行，从东山脚到西山根，开阔的河谷平原上，麦苗葱绿，野草芬芳，菜花开了，片片金黄，小河闪耀着从田野中流过。一处处绿树成荫的杨树林，一处处红檐金顶的寺院，河流渠口上还有一座座水磨，蓝天里有小鸟在唧唧鸣叫，田地里藏族妇女在劳动、唱歌……多美的田园诗啊！可是直到不久前，田园诗的纱幕下都是农奴、奴隶们呻吟的生活，今天，他们才开始酝酿着解放。

河对岸，一个蓝色琉璃瓦顶的庙宇从树丛中伸出来。走不远，河这边又一个漂亮的金顶寺院，这是昌珠寺，据说是文成公主修的，内有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画像，不知确否，今天来不及看了。

太阳升高时，我们来到一个水渠纵横、庄稼茂盛的去处，远见一个紫色围檐方城堡似的大房子，从一片树林中露出一角。这就是凯松谿卡了。据说这是西藏叛乱集团头子索康·旺清格勒的祖辈——老索康起家的庄园。由中共山南分工委副书记张增文率领的民主改革试点工作组已来这里工作了一些日子。我们的车子一到村头，光屁股的孩

子们就跑过来招手、傻笑。汽车刚停下，村民们就来帮我们搬行李，领我们进了大庄宅。这是一座古老的石砌的口字形三层楼建筑，典型的庄园主住宅。走进大门，从左右两侧可以进入天井，天井四周楼底是马棚和仓库。大门正对面几步远是一个双走道大楼梯，楼梯板被奴隶们的赤脚磨出了一个个窝窝。楼上二、三层西厅是主人的居室和经堂，窗外垂着宽大的黑色牛毛帘幕。我们被安置在三层楼上，空洞洞的大屋子里一股灰尘气味，外檐下麻雀、燕子噪个不休，整个宅子给人一种荒废的阴森森的感觉。

二楼灶房里，一个老婆婆看着灶火，她灰发蓬乱，目光呆滞。听说她十二、三岁就到庄宅里当朗生，已五十多年了。一楼马槽围了大房子一周，足可拴成百匹马，但马全部被参加叛乱的主人带走了。门口还有一个独木舟样的大马槽，槽下躺着个老马夫，听说他是给庄园养了四十年马的朗生，他一生冬天住马棚，夏天睡草房顶，这次工作组来了，才给了他一间屋子，但他有时还习惯地躺在大马槽下。这老头儿满脸的皱纹使眼睛鼻子变了形，样子有点傻里傻气了。

下午，工作组召开全庄园农奴大会，选举农协筹委会委员。

强烈的阳光从树木枝叶的空隙，筛落在作为会场的林中草地上，溪水从林边潺潺流过，在树丛吃草的毛驴的铃声叮叮响着。全庄园的男男女女，大人小孩，从大庄宅四

周的小土屋，从宅子底层的马棚、外院的牛舍，陆陆续续走来了，在草地上坐了一大片。谁只要看一眼这群人，就会多少懂得一点什么是农奴制度。这老小二百多人，没有一个人穿一件完整的衣服，全是破烂的象麻袋样的粗毛衫裙，那上面不是补丁，就是发亮的油污。妇女和孩子们几乎没人穿靴、鞋，全赤着脚。再看看这些囚首垢面的面孔吧！这个白发苍苍、眼睛半瞎的老婆婆是欧珠错姆，从八岁当朗生到六十岁，血汗榨干后被赶出大门外，她讨饭已经三年了。这母女三代朗生，妈妈是其美错姆，脸象只干瘪橘子，女儿黑枯面孔，头发蓬乱，手里牵一个瘦骨嶙峋的痴呆的孩子。如果没人告诉，你不会相信这孩子已经四岁。由于一生下来就没吃饱过，所以现在刚到妈妈的膝下，可是早已被登记为朗生了。只有满脸汗泥的小伙子和脚丫黑黑的姑娘们有些生气，他（她）们在笑咪咪地议论着什么。就是这些人，今天破天荒第一次要掌握自己的命运。

大会开始了。人们仰着头，半张着口听张增文同志讲话。这位分工委副书记的广东腔没人听得懂，可是人们全神贯注地看着他，借助一位藏族工作人员的翻译，听着从没听过的话：“诸位老乡们！今天是我们这些受苦的人、受压迫的人、自己人，开第一次大会。开会做什么？大家知道，你们的主人索康叛乱了，跑了，‘谿堆’（庄园代理人、管家）也跑了。压迫你们的人垮台了。我们要选出自己的人来领导大家，领导我们翻身，过新生活。……谁来

领导呢？不识字的人行吗？女人行吗？都行啊！只要心好，办事公正，大家信得过就行。……”人们嘿嘿笑了。“我们要成立一个受压迫的人的组织，种庄稼的人的组织，农民协会，今天先成立协会的筹备委员会。”这两天，人们已经提前进行了酝酿、选择、比较，现在候选人名单公布了。“主任委员尼玛次仁！”大家望一望人群一角的一个青年人。他面色黝黑，额头突出，深眼窝里闪出深沉又带点憋气的目光。这个小个子青年从九岁起就接替去世的父亲到凯松谿卡当“差徭”（一种做农活的奴隶），已当了十五年。人们听到他的名字，有的咕哝道：“他从小受苦，不会往坏道上领我们的！”姑娘们笑一笑。“副主任委员基嘉！”人们又用目光找到了那个高个儿大脸庞的姑娘。她害羞了，低下了头，两只大手摸着破裙子。她是个个朗生，讲起身世，她说过：“我不是吃糌粑长大的，是受苦受罪、挨打挨骂长大的！”她的主人，一个精明的大差巴，二地主，给她吃一个人四分之三的口粮，要她干两个半人的活。人们对她当然是信得过的。还提出又一个副主任委员乌金，一个面孔黄黄的差巴。还有委员阿旺、多吉等，包括正、副主任共九个委员，其中四个是朗生和差徭，三个“堆穷”（意为“小户”，是一种没有“差地”，向领主交纳人头税并服一定劳役，靠租种小块土地、作小手工工业或打短工为生的农奴），两个差巴。

人群分成了三堆，开始讨论，在堆穷这一堆里，一个

络腮胡子、脸上的皱纹成了小壕沟的老人从草地上站起来，一看就知道，这老人虽然在饥寒中度过了将近一生，但仍有顽强的生命力，他名叫拉珠。他说道：“诸位邻居亲戚们！今天是我们祖祖辈辈第一次自由地做人，头一遭由我们自己挑选人，挑选出来不是压迫我们，不是打我们、骂我们，而是领着我们翻身的人……。尼玛次仁年轻，基嘉是妇女，可是他们都是自己人，我们从他们会走路时就看着他们受苦，他们是不会领我们走邪路，不会忘掉我们的。我们要翻身，要自由，过好日子，就要选这样的人。我们都是从昏睡中刚醒过来，需要共产党和我们挑选的人用手牵着我们走路……”

朗生一群里，大家只是嘿嘿笑，没人讲话。他们当奴隶受压迫太重了，一时还不习惯于独立发表意见。沉默了好久，笑了好久，一个老妈妈低声说：今天这位“本玻”（长官）说的，是我们心里的话，大家挑选的，是我为他们祷告的人。“可是我不会说什么，我不会说什么！”说着，她把两只粗骨节而枯瘦的手合在一起，拜着，颤抖着，没有牙齿的嘴也在哆嗦着：“吐吉其啦！吐吉其啦！”（谢谢啦！谢谢啦！）

差巴一群里很活跃，他们过去虽然也人身依附于领主，但和完全没有人身自由的朗生不同，见识也多一些，所以对候选人一个个议论了一番。

最后，人们在阳光照耀的林中草地上坐了一圈。尼玛

次仁、基嘉、乌金、多吉、阿旺等站在圈中桌子前面，他们额上、鼻子上都出了汗，眼睛放出喜悦的光彩。围着他们的人们把手高高举起来了，这是一些终年劳碌的手，被人支配的手，今天第一次自由地举起来，在这个庄园前面，过了第一次民主生活。

主任尼玛次仁讲话啦！

“诸位乡亲们！”他刚一开口，孩子们就在下面笑了起来，他们不能理解这个过去睡在主人屋檐下、在主人面前不能抬头的朗生今天要干什么。大人们吆喝着制止了孩子们不懂事的举动。尼玛次仁继续讲下去：“乡亲们，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了！大家挑选了我，我一定好好办事。希望大家团结得象一家人，一个人，彻底把叛匪、坏人消灭，我们才能生活，才能过好日子！”人群里一片掌声。

* * *

庄园里流传着许多时兴话，“没想到，我们的尼玛次仁还很能干呢”，“是要有基嘉这样的人一起领导，不然谁疼我们女郎生”。乌金，这个善良又有点糊涂的穷差巴，人们说他若遇到别的喜事，要瞒过母亲和妻子，拎一壶“羌”（青稞水酒）悄悄找伙伴们去喝的，今天，他当了头儿，人家好几个人来请他喝酒了。尼玛次仁的主人扎西，这个有十二个朗生（包括差徭）的富裕差巴，今天对尼玛次仁特别客气：“你当了主任，一定热心给大伙办事的，我知

道你是个好心人！”见人便说：“尼玛可是我家的人哪！”多吉的主人也说了：“多吉姑娘在我家没受过什么苦。”

※ ※ ※

晚上新当选的主任、委员们，喝过了作为晚餐的糌粑糊糊，就来到了大庄宅，上到了三层房顶。可是一到索康家这个老经堂门口，四个妇女，基嘉、多吉、××、××，就踟躇了：“我们还是到楼下马棚边去开会吧！”“要不到林卡的草地上。”这个阴森森的大屋子，不但给她们以恐怖的感觉，而且按老规矩，女人，特别是女奴隶，是从来不准进主人家经堂的门的，即使这房子空着。工作组老陈同志来了：“进来吧！是你们自己当家了，还怕什么？会就在这里开。”她们悄悄进了门。

八个委员（一人缺席）和几个工作人员，举行了农协筹委会第一次会议。他们今天先商量怎样处理“根保”（小头人）和格桑占堆的事。这两人是索康和“谿堆”（领主派的庄园管理人）的狗腿子、地头蛇。他们多少年来为索康忠实服务，打骂农奴们，口里喊着“吉扣秀！尼扣秀！”

（拿这个来！拿那个来！）百姓稍一怠慢，“鞭子打过来，靴子踢过来”，叛匪在这里盘踞的几个月，根保四处跑，催粮要草，动不动打人。格桑占堆带着一个叛匪小头目闯进一户堆穷的家，把年老的父母关进黑屋子里，让叛匪小头目强奸了这家的姑娘……

怎么办？

开头，两个差巴委员讲了这两个人的很多恶行。乌金说：“这两个家伙干的坏事太多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他俩被逮起来了，在我们手里。我们要杀就杀，要砍腿就砍腿，要剁手就剁手，大家说吧！”可是他自己不拿主意。

尼玛和基嘉却有自己的主张：我们开个群众大会，把他俩带来，有苦的诉苦，有气的出气，然后重重地办他们，让他们劳动一段时间。

大家都同意这意见。

张增文同志问乌金：“真的同意吗？”

他答：“却内（真实的）！不是脖子以上的话（只口里说），是脖子以下的（心里的）！”

然后又研究了大会的开法。

当大家从大经堂走出时，天早已黑了，初夏的风，吹得人真舒畅啊！

感谢工作组同志，今天让我看了这多事，参加了这么多活动。感谢同来的阿旺丁曾同志，领我到处看、问、翻话，来庄园的第一天，我们开始了解了农奴制度。

六月七日

清早一醒来，就听四周树林里鸟儿鸣叫，麻雀从大房子敞着的窗子飞进飞出，整个上午补记昨晚没记完的日记，十二点才吃了早饭。

工作组同志和群众同甘共苦，有的和朗生一起睡在牛

棚、马圈里。陈涛同志的爱人石衡病在了草棚里。她们一早吃点东西和老乡一起下地劳动去了，到晚十点才吃晚饭，饿得胃病发了。

中午，在大门外水池边遇到了其美错姆老妈妈，她家是四代朗生了。晚上我们访问了她。老妈妈白发蓬乱，满脸折皱，穿一件牛毛羊毛混织的粗褐衫子，这是她唯一的一件衣服，夜里又当被子。她两只脚黑黑的长着厚皮，有点不象人的脚了。谈话时头老在打颤。许多事情，她已记不清了。只记得：

她的母亲就给索康的凯松谿卡当朗生。父亲是一个差巴户的朗生，常年代替这差巴到谿卡来支“乌拉”（服劳役）。有一年冬天下大雪，父亲被派到朗噶泽出乌拉，一去没有回来，后来听说是死在那里了。不久，母亲瞎了，“聂巴”（管家）想起来就给点吃的，想不起来就不给，不多日子，就连饿带糟踏死了。那时她才八岁（实际七周岁，老妈妈用手比划：只这么高！她的手离地三寸，表示很小很小）。虽然谿卡有许多空房子，但朗生们从来不准进房子里住，他（她）们只能睡在马棚牛圈或檐下廊边。老妈妈从记事起就住在一个炒青稞的破棚子里，以后又住在马棚里。她八岁开始接替了母亲干活，先是给谿堆老婆带孩子，大点了，就煮“羌”，捻毛线，放牛、铡草。每天早上，聂巴（管家）发给一点糌粑，一碗清茶，一点点酥油，劳动一天，晚上喝一顿糌粑糊糊。就这样给谿卡当

牛马，整整干了六十年。冬天，风雪吹进破棚子，她在破毛褐子衫下蜷缩着，象睡在雪窝里。夏天雨水流进了马棚，夜里醒来，全身泡在和着马粪尿的雨水里，没有一小块干地方可以躺一躺。放牛出去，一天不能回来，如果天下雨早回来，就遭聂巴（管家）恶骂毒打。老妈妈一生没有丈夫，她和一个在谿卡支乌拉的人要好，生了两个孩子。第一个是男孩，生下就饿死了。第二个是女儿，活了下来。生孩子也在马棚一角，身子虚弱，好心的其他朗生帮他向主人要点糌粑。

她四十多岁时，有一次铡草铡掉了一个手指，鲜血象壶嘴倒水一样向外流，她昏过去了。十五岁的女儿珠玛哭喊着：“妈妈手指铡掉了！”边哭边报告谿堆、聂巴，但没人理她。老妈妈醒来时，只记得有条狗把她的手指叼跑了。没有药，也没东西包扎，眼看着手指向上烂。后来还是一个朗生想了个办法。他弄来了些酥油，煎得滚开，把老妈妈的手指残根放在滚开的油里，嘶啦一响，她又一次疼得昏了过去。这样，手才没有烂掉。她死活主人不管，可是铡掉手指第二天，聂巴就派她放牛去了。六十六年了，她没住过房子，没穿过鞋袜，没吃过饱饭，没穿过一件完整的衣服，也没有自己的家，这就是一个朗生典型的一生！

她六十岁时，放牛走动不得，向谿堆请求，才让出乌拉的女儿代替了她。

叛匪在时，马棚里拴满了马，把她们母女和外孙女三

人挤到露天睡觉。叛乱分子一见她们母女就命令干这干那，稍不如意，就威胁说要杀她们，最后她们只好躲到大树林里去了。叛乱被平息后，她们仍不敢住进房子。工作组同志到了庄园里，一天夜里下大雨，看她们母女孙三人在半露天的破棚子里，淋得可怜，就让她们搬到空马棚里，给了她们两个毛垫子（农协筹委会很快要研究分房子，帮朗生安家）。

老妈妈的外孙女，因为食物不足，瘦小得很，四岁了还不会说话。我们问孩子的爸爸是什么人，老妈妈望着棵大树说：“不知道谁是她爸爸，可怜的孩子，就象这树上的叶子一样啊！”

六月八日

山南雨季快开始了。今天落了几次阵雨。

上午听工作组陈涛同志介绍情况，直到十二点吃午饭。

从谈的情况中，可以看出山南地区农奴制度带有浓厚的奴隶制残余，更黑暗、落后。如凯松谿卡就有个自立的规矩：“谿堆”（也叫谿本，即庄园管理人）看到某个差巴户差地多，劳力少，无力给他支差，他就强行从劳力多的差巴户抽一两个人给劳力少的差巴户当朗生，然后给他出乌拉（支差）。这样就把一部分差巴户人口变成了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的奴隶。凯松谿卡四十四个朗生中，这种

抽来“补差”的朗生就有二十多个。也有的差巴户主死了，家人无力经营差地，领主就把差地收回，由谿堆用朗生劳力经营，差巴户的家人就被谿堆抽来作朗生，或调派给别的缺劳力的差巴户作朗生。

再有，许多农奴、奴隶，只有夫妻生活关系，没有夫妻共同的家庭。如堆穷泽仁多吉和一个差巴家的姑娘是夫妻，但如泽仁到妻子家，差巴户不干，因此两人只能分开生活，只是到晚上，泽仁到妻子处睡。还有的男方是一家的朗生，女方是另一家的朗生，也不能合在一起独立成家。这也反映了奴隶制残余。同时说明由于劳役（支乌拉）负担过重，农奴主就利用奴隶制残余，来无偿占用劳动力，从而造成了农奴夫妻生活不正常。

傍晚，在庄宅大门口，遇到了谿堆的马伕格桑。矮瘦个儿，受苦的脸，任何时候都戴一顶帽檐下垂的破呢帽，是凯松谿卡朗生中一个有趣的人物。

他的父母是“雅陇谿卡”（也是索康家的一个庄园，距此地只数里）的一户穷差巴。他从九岁起，被派到凯松谿卡当长年乌拉，放牛喂马。我们问他个子为什么这么小，他说：“从小受苦，压得长不起来呀！”他当乌拉当到三十多岁时，父母死了，他自己无力经营这份差地，谿堆就把差地连同房屋、牲畜一齐收回，拨给另一户人家顶名支差纳租，把格桑也拨给了这家当朗生，但仍在谿堆这里作常年乌拉。主人每天给一升（一克的二十分之一，大约一

斤)糌粑,每五天另加一升,作为晚饭煮糊糊的粮食。问他一升有多大,他答:“不大不小,正好。”再问到底有多大,他不会说,就到马棚一角把木碗拿来给大家看。问他能吃饱吗?他说:“平平两碗,早晨一顿差不多。”“晚饭怎么办?”他笑着拍拍肚子,表示只好空肚子了,说得大家一阵苦笑。

这个可怜的人一生都是在半饥饿中度过的,五十多岁了,一年四季没穿过靴或鞋。谿堆每年从“乌拉工薪地”的收入中,给每个支长年乌拉的人两克青稞,格桑就用这青稞换点破衣服。每年秋后,他在放马时拾点青稞麦穗,用来换点盐巴、茶叶。他到庄园四十多年没住过房子,整年住马棚顶上,风雪天也不下来。只有下雨时才下来躲在马棚一角。全年只有过藏历年时,主人给一次带肉的菜粥或菜饭,算是尝尝肉味。就这样还经常挨打挨骂。他说聂巴是大鼻子麻脸,一副凶相。谿堆是白脸狐狸,有“学问”,打人更凶狠。他学着大鼻子聂巴和白脸谿堆的口气,哼哼着,喷着吐泡怒骂着:“给!格桑,噶巴卓松?”(嘟!格桑,你到哪儿去?)这两个家伙常毒打他,问他打过多少次,他说记不清了,“比我的岁数多得多”。“有时他们喊我不在,等我跑过来时,就抓住我的头发,拿到什么用什么打。用马鞭、石头把我的头打破过几次,血直流!还有几次,屁股和腰身被打得青肿。这两人,不是人,如果现在解放军抓住他们,我一定要报复,他们怎么打我,我也

怎么打他们。”

他说聂巴和谿堆每次出去以前，他都要把马先备好，一手抓着马嚼口，一手坠着镫。等他上了马他才撒手。还要记住去的方向，到时候好向那个方向等。如果他们回来时他不在那里侍候，一见面马鞭子就落在头上。

问他见过大贵族索康没有，他说见过一次。两三年前他坐小汽车来过一次。来头几天，谿堆、聂巴就吩咐朗生、乌拉打扫房子，擦亮窗子，门口挂上新经布。到的那天，大家站在门口恭迎。摘下帽子，低头吐舌（表示敬畏）。临走，给了每个乌拉五两藏银（一个银元的三分之一）。他在索康家当了四十年奴隶，这五两藏银是唯一的赏赐。

有人问他，如果捉住索康，敢不敢揍他？他说：“不敢。”“为什么？”“他是大官呀！”农协委员阿旺向他宣传以后，他同意了索康是大坏蛋，是农奴们的敌人的看法。

格桑的破呢帽不离头，问他为啥？他说：“别看这帽子这样破，是用六十两藏银买的呢！刚买的时候很漂亮，已戴三年了。”原来这是他唯一的家当。“你哪里来的六十两银子？”“一点点，攒了几年攒的呀！”

天落雨了，格桑冷得打起战来。问他有什么要求、希望，他想了想：听说要给朗生、乌拉长“工资”，每天给两升糌粑（原来一升），什么时候开始呢？又逗得人们笑了。

晚上和阿旺丁曾、马兢秋同志研究凯松谿卡调查提纲，又记日记，已到凌晨三点了。

六月九日

经几日调查，对这个庄园的基本情况和农奴制度在庄园中的体现有了初步了解。

这“凯松谿卡”还不是老索康家的起家的庄园。他家的老庄园，在南面山下。五世达赖（三百多年前）时，他家出了个“森本堪布”（达赖的三大侍从堪布之一，管达赖的起居衣着），老索康便借势霸占了这片水美土肥的土地，新建了一个庄园，据说因站在房顶上可看到三座神山，所以起名为“凯松谿卡”（三吉庄园）。

这庄园共有一千二百多克土地（克即斗，一克青稞约二十八斤。一克地即可撒一克种子的地，约一亩），三百多个农奴（大人小孩全在内），都属于索康家。据说索康有庄园、牧场十几处，这是其中之一。索康家在拉萨，平时派一个小管家住在庄园，就是“谿堆”。

庄园这一千二百多克土地，分为三种形式：

一种叫“差岗”，即差地，是由差巴户耕种的“份地”，差巴种这种地就世代为农奴主支差纳贡。过去庄园中以这种差地为主，后来剥削方式变化，差地只剩下了十八“岗”（每岗十五到三十克不等），共三百七十克，不到全庄园土地的三分之一。

一种是谿卡的“自营地”，即由谿堆直接经营，靠由差巴户出的长期“乌拉”（无偿劳役）耕种的土地。共六

百六十克，全是靠近庄宅的水浇地，其中一百多克是索康家侵占西藏政府的差地。这种地的收获全归领主和谿堆所有。

还有一种是谿卡出租地，是租给农奴种的。共约一百五十克，分为两种形式，一种叫“博”，即定额租地，原每克地交租三克半，后来有的提高到六克。还有一种叫“谢”，即对半分租地。

此外还有少量土地是谿堆用于杂项开支的。

庄园中的农奴也分为三种。

一种是差巴，共二十四户，耕种十八岗差地。每岗地每年出两名常年乌拉在谿卡自营地上无偿劳动。此外还有许多实物和短期的人差、马差、牛差等负担。差巴虽独立经营土地，但其劳力六十岁以前不准随便离开庄园，如要离开，必须经谿堆允许，还要找一个人顶差。二十四户差巴中，一户大差巴扎西（她丈夫生前作过谿堆）种一岗多地，养十二个朗生（家奴）和差徭（当常年乌拉的人），放粮食高利贷。还一户是“根保”（替谿堆跑腿的小头人），能吃饱饭，其余皆终年劳苦，不得温饱。

第二种是“堆穷”（意为“小户”），是没有差地的农奴，共三十五户。他们靠租种小块土地、替差巴户支差、作短工、作木匠、织氍毹等维持生活，他们要向领主交租、纳人头税和出乌拉。

第三种是朗生和差徭，五十多人。“朗生”意思是

“家里养的”，干家里活的，即家奴。他们全无人身自由，朗生的子女，男随父（父亲是谁家的朗生，他仍属谁家），女随母，仍是朗生，即世代为奴。不但领主、管家有朗生，有的差巴也有朗生。“差徭”，原意是支乌拉의 奴仆，主要指在谿卡自营地上作常年乌拉的人。他们中有的是差巴家的人，身份仍是差巴，有的是谿堆从差巴、堆穷中抽调来，替缺劳力的差巴户出乌拉的，这后一种人，也是终身为奴，所不同的是他们主要在田间劳动。

对农奴的剥削，有四类情况：

第一类是领主对农奴的剥削，其征收的实物、银钱和支用的差役如下：

（一）谿卡自营地六百六十克，每年由二十四户差巴派出常年乌拉三十六名（差巴共种差地十八岗，每岗派二人）负责耕耘收打，农忙时，还增派短期乌拉（时间三、四个月）七十二名。这些地每年可收青稞、豌豆等粮食七千多克。其中四千五百克由谿堆上交领主索康，其余谿堆自得。乌拉的口粮，由差巴出。

（二）谿堆每年向索康上交面粉五驮（每驮一百二十斤），荞麦面二驮，作稀饭用的青稞粒半驮，菜籽油五驮，肥猪一口，鸡蛋一千个，毛线、麻、皂角等各若干。其中除粮、油从谿卡自营地、出租地收入中筹办外，其余都向农奴征收或低价征购。

（三）谿卡出租地每年收青稞五百克，全由谿堆自得。

(四) 谿堆每年向二十四户差巴收“生活补助费”青稞三十五克；收“擦任差”（吃牛肉的钱）每三年青稞三十五克；收“巴玛差”（吃酥油的钱，按各户养奶牛头数计算）每头奶牛酥油六藏两（二斤多）；此外还有“约惹差”（搓绒差），每岗地为谿堆搓毛线十五藏两，发给多少毛，交回多少线。

(五) 索康在凯松谿卡征收的粮食和其他实物大部分要运往拉萨，索康在山南其他庄园、牧场征收的粮食、肉类、酥油等，以及从拉萨运到牧场出售的茶、布等也要经凯松转运，这些物资的运输，每年要由差巴户支差运送，出动牲畜二百多头次，人力五十多人次，每次从五天到二十天（如往返拉萨一次需二十天）不等。

(六) 索康家盖房，运木料（从凯松到泽当渡口）所需劳力，要随叫随到。如一九五二年索康在拉萨盖房，从凯松要乌拉十多人，时间一年。

(七) 谿堆每年外出做生意，进行农牧产品交换，要支用人差、畜差若干。

(八) 凡堆穷户每人每年要向谿堆交人头税藏银三到十五两，出乌拉若干天，或十天中五天自己谋生，五天给谿堆干活，称为“半乌拉”。

第二类是藏政府对农奴的剥削，称为外差（领主的直接剥削叫内差），主要是兵役负担和官员过路、官粮及官商物资过境运输等负担。

(一) 凯松谿卡的差巴、堆穷共负担噶厦常备兵（藏军）三人，“森木炯”（拉萨每年“点兵节”受检阅的兵，除受一次检阅外，还担任一些其他劳役）二人。藏军每人每年口粮青稞二十四克，服装费藏银四百两。“森木炯”减半。

(二) 运官粮和官商物资，每年出牲畜四十五头次，人力十五人次，每次四至七天。

(三) 二十四户差巴每年轮流派出马伕一人、马二匹，到附近马站支差三个月，供过路官员乘用。

(四) 官商骡帮从此路过时，差巴户要共出藏银三十两和六人吃用的油、肉、茶。

第三类是是高利贷剥削。凯松谿卡五十九户农奴中，除大差巴扎西家每年放高利贷数百克青稞外，其余五十一户借高利贷（另七户堆穷一无所有，没人供给）青稞五千多克，藏银七千多两。债利一般为春借秋还，借五还六，少数的借七还八，借十还十一。当年还不起，第二年将利作本。多年还不起的，债主就拿走牲畜衣物、夺走差地的收获，或逼差巴、堆穷卖身抵债作朗生。

第四类是宗教负担。寺院都有自己的庄园和农奴，但贵族所属庄园的农奴，也要向附近寺院交纳一部分实物和服一定劳役，如派人派马运送祭神的青稞，摊出“消雹”

“灭虫”（喇嘛念经消除冰雹、虫害）费和自家请喇嘛念经的的开支等。

以上只是大概情况，待详细了解后写一调查报告。

上午去凯墨谿卡。从凯墨谿卡向南，沿相布河走约三里即到。路边是石砌的河堤，河中流水淙淙，两岸是柳树和一种带刺的灌木丛林，丛林中开着野玫瑰样的花，画眉鸟在林中鸣啭，这地方真美！

凯墨谿卡是拉萨大贵族凯墨家的庄园，也是一所高大的紫色围檐房子，周围有树林、池塘，环境好。大门前有一个石头垒成的经壁，每块石头上都刻着“六字经咒”。进入大门，门洞上方挂着一个大黑狮子狗的标本，二门外铁链上又拴着一只大黑狗，给人以恐怖之感。二门门洞尽头就是双道的大楼梯，格式和凯松谿卡的相仿，梯阶也是被磨得光光的只剩下了一半。从庄宅前后直径两公尺左右的大杨树和这楼梯看，这谿卡有二、三百年历史了。谿堆因参与叛乱已被逮捕。十几个朗生住在大庄宅里，工作组也住在这里。我们上到二楼，见工作组的女医生正在走廊里给老老少的农奴们治病。

工作组长老何向我们介绍了这谿卡的情况，其规模、制度与剥削方式等与凯松谿卡相似。

全谿卡共有土地一千一百多克。其中谿卡自营地约五百克；“差地”十六“岗”，约四百克；“谢”、“博”等出租地二百三十二克。

全谿卡有家的农奴三十四户，其中差巴十六户、堆穷十八户。另有朗生二十一人，全是谿卡的，还有差徭十多

人，是谿堆从劳力多的差巴、堆穷中征调的劳力替劳力不足的差巴户“补差”的，实际已成为田间奴隶。

十六户差巴中，一户较富一点，种一岗多（约三十克）差地，另外还租一些地，农忙时雇较多短工，但家里无朗生，也不放高利贷。有一私人水磨，群众来磨糌粑，他收些糌粑。其余十五户都是穷差巴。堆穷户有的租种小块“谢”、“博”地，有的作铁匠、铜匠等，每口人每年向谿堆交人头税五至十两（藏银）。

凯墨谿卡的谿堆每年从自营地上收获以青稞为主的粮食四千多克（自营地由三十四名常年乌拉耕种，包括十多名差徭），从“谢”、“博”地上收租粮食一千多克，总计约六千克。谿堆上交领主凯墨二千八百克。

另外，差巴每五克差地交清油（菜籽油）一藏斤（约六市斤），由谿堆收齐交凯墨。

差巴户给凯墨家无偿运送木板、粮食、清油和其他货物，每一差岗每年出畜差（用驴、牛驮运东西）四百头天。

谿堆向农奴放债九百多克，春借秋还，借六还七。

庄宅两边，两个打麦场，一个是谿卡自营地用的，一个是差巴户共用的。差巴的打麦场上，收了青稞，在场面上立即还债，有的差巴还了旧债马上借新债。谿堆大斗入、小斗出，一出一入差1升（一克的二十分之一）。

老何还谈到，现在朗生要求解放心切。他说，桑珠德钦谿卡一个差巴户的朗生，十七岁的索南多杰，参加修公

路，得了六块大洋的工资，吃了一元，花了二元买了一条裤子，下余三元。他回来后，主人（差巴户）把三元银元和那条裤子全收走。索南多杰就找到工作组告状，以后要了回来。他盼望解放，自己安家。

今天凯墨谿卡的农奴开大会，选举农协筹委会，开始民主改革。

在凯墨谿卡的一个穷差巴家，我们访问了七十二岁的老人格桑。他原是热吉甫寺的堆穷，他从十五岁起织氍毹，织了一辈子，都没有一件完整的衣服，老来无依无靠，来投了穷差巴妹妹。

我们找到他时，他正坐在一个小土屋的土地上和一位老婆婆（他妹妹）吃饭。老人黑红脸，灰白的头发，一半是短发，一半梳个小辫子，笑的时候，显得开朗天真。他上身穿的一件短褂子，粗毛布补丁，一层压一层，象是用巴掌大的麻布片缀起来的。谈起这件衣服，老人说：这件衣服，还是孩子的妈妈在世时，我用自己织的布作的。从那以后，再作不起衣服了。作这件衣服时，我大女儿才十几岁，现在她已生了七个孩子，不知过了多少年了。这衣服，已成了“玛没东查”（直译为“没底千补”，补，总要有底布，没了底布，就是补丁摞补丁，也就是千补百衲）。老人一生，是在极端贫困悲惨中度过的。他原是热吉甫寺拉让的农奴，堆穷户。他从十几岁起，每年秋收时，给寺院当乌拉（无偿服劳役），一年还交八“章噶”（小铜币，

每章噶合藏银二十分之一两)的人头税,平时就串乡给人家织毛布,管吃喝,一天工资四章噶。织到六十岁,眼花手笨,没人要他织了,就回到寺院。寺里让他运水。从山脚到山顶寺院,要爬一里多路的陡坡,他年老无力,只好一手拄拐杖,一手拉着驮水的牛尾巴上坡。每天上下五、六次。“腿象掉下来一样疼”,但为活命,就得干。他妻子生前是另一个寺院的差巴,俩人因是不同主人的农奴,不能在一起生活。妻子死后留下两个女儿替妈妈顶差,一个到寺院作常年乌拉,一个经营差地,穷得管不起老爸爸吃饭。老格桑到七十岁爬山运水实在爬不动了,就外出讨饭去了。他说:“许多次,险些在恶狗嘴下丧命。”讨了一年,走不动了,只能找妹妹来了。他讲给寺院运水时,寺院一天发给一“批”糌粑,“批”是一克的二十分之一,即升。“批”有多大,他妹妹拿出个小升给我们看,一“批”(小升)约十两。老人说,“聂巴”发糌粑时,是轻轻筛到“批”里的。

现在怎样?“现在好了!”老人说:“不出乌拉了,也不会耳边‘阿钟’(传令差)的马铃声一响就心慌了,眼下虽然还吃不饱,但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起,都由自己了,真轻松!”老头很幽默,希望很快改革,能吃饱饭。

下午回凯松卡。农协筹委开会研究开斗争大会,斗争谿堆的两个狗腿子——小恶霸麻子和根保的事。乌金、尼玛次仁、阿旺、基嘉都来了,在走廊等人。尼玛次仁欢欢

喜喜，说：“今天吃了个大饱，干了四碗糌粑！”乌金喝“羌”喝多了，满口酒气，也开玩笑说：“尼玛次仁啦！你应该告诉你的女主人扎西，说糌粑吃腻了，中午要吃面条，晚上要吃肉，……”逗得大家笑个不止，他不紧不慢继续说：“还要告诉扎西，把卡垫垫得高高好好的，晚上陪我一起睡。还要把她的孩子们赶到一边，免得碍事。”更惹得大家笑得直不起腰，基嘉姑娘害羞得跑开了。从玩笑里，看得出这些受尽压迫的人，开始翻身时的快乐。

尼玛次仁二十四岁，九岁（八周岁）就到扎西家作差徭。他父亲是堆穷。母亲是小差巴，年轻时，五天在小块差地（只二克）上干活，五天给谿堆支乌拉，以后改为当“其生”（外奴，在地里干活），给谿卡自营地放水，一年给十七克青稞口粮。尼玛次仁刚到扎西家时，常挨打，有时哭着回到妈妈跟前，妈妈领着他到主人面前求情：“孩子小不懂事，不听话的时候多教训，抬抬贵手不要打他。”主人严肃地说：“他是我家的人，我愿把他团成团，装在口袋里，由我！我愿把他拉成条，缠在腰里，由我！”妈妈只好哭着退下走了。所以说尼玛从小吃尽了苦头。现在乐得闭不拢嘴了。

六月十日

凯松谿卡今天举行斗争叛乱分子、地方恶霸的群众大会。从早晨起，谿卡的大门里，双行道的楼梯上，人来人

往，进进出出。本谿卡和外谿卡的农协筹委会委员，赤脚的妇女，戴破呢帽的男人，头发蓬乱、满脸黑胡须的老农奴都来了。中午，男女老幼集合在庄宅前林卡的树荫下，大会开始了。当了叛匪小头目的谿堆，索康在凯松谿卡的代理人逃跑了。现在，跟着谿堆作了许多坏事的根保和小恶霸平措占堆被带到了会场前，面对大家垂头站立。尼玛次仁，那个从八岁起就给扎西家当差徭的小伙子，新当选的农协筹委主任，今天第一次穿上了皮靴子，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站在一张满是油泥的小桌前讲话了：“诸位乡亲们，现在大会开始了。过去，贵族索康、谿堆、根保、坏人坐在上面，把我们踩在下面，剥削、压迫了我们多少年，最后发动了叛乱，阻挡我们翻身。现在，中央政府和解放军帮助我们把他们打垮了，赶走了，消灭了。我们从地下站起来啦！我们第一次举行这样的大会，斗争坏人。……”接着他历数根保和平措占堆跟着谿堆干坏事的罪行，然后说：“我们的苦，象河水一样，不知流了多少年，今天还在流，今天，我们要把苦水倒出来！”

尼玛次仁一讲完，乌金又走上来，说：“今天我们开大会，就是要本着天下一家人的精神斗争这两个坏蛋，过去我们有苦有冤不敢说，今天剥削阶级灭亡了，以前被他们当成地下虫子的人，现在得到了自由……。平措占堆、根保作了许多坏事。以前他们跟着谿堆打人骂人，叛匪占据时，帮助叛匪抢东西。叛匪逃跑时，他们帮叛匪把炮弹

箱子藏在草里。把谿卡仓库里的贵重东西、粮食偷运到自己家里，那都是我们的血汗啊！……”

一个老妈妈站起来揭发：他们还藏了许多枪，勾结反动派，准备让反动派打回来。

一个名叫白干的青年站起来，呼呼喘气，说不清话，断断续续地说：我被他们打得说话不行了。我和姐姐从地里回来，拾了他田里的一穗庄稼，他就把我和姐姐毒打一顿。

一个蓬头垢面的的小姑娘站起来就呜呜哭了。她是十三岁的孤儿白玛玉珍。父亲是个穷差巴，她很小时父亲出差病死在外边，妈妈背着她支差种地。一次妈妈割草时，和领主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吵起来，这恶霸就把她妈妈打得死去活来，妈妈流着鲜血爬回家，第二天就死了，临产的孩子也死在肚子里了。白玛声泪俱下地哭诉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瞪直了眼睛，泪水顺着枯瘦的脸向下流，她张开两手，抢地呼天：“我请共产党、人民政府、诸位乡亲们替我们作主，……我的两个外孙女，可怜的孩子，没有妈妈了，她们的妈妈被野兽吃掉了！这些野兽就是索康，就是勾结叛匪的谿堆和他的狗腿子平措占堆……。”全场男女老幼都哭了。这老婆婆就是小白玛的外婆，她说出了农奴们的共同遭遇。悲愤的呼声象春雷一样响了起来：“打倒万恶的奴隶制度！”“消灭剥削压迫！”

本来会前已经讲好，斗争大会上只动口，不动手，还